

# 不拖不躲,真相才能跑赢谣言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

阅读提要  
网络世界既生繁花,也长稗草,舆论场的自发性、突发性、多元性、无界性突出,清晰看到这一点,就会对真相供给的主动性多一些敬畏与重视,少一些打太极、躲猫猫、和稀泥、拖字诀。

东湖  
评论

连日来,舆论高度关注的“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让路风波”,随着广西防城港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当事人李先生接受道歉,暂告一段落。

回顾这一过程,一起村道上的纠纷,最终演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高热话题,引人深思。因为真相的供给问题,公众对“她是谁”的疑问越来越深,出现的谣言更伤及与事件无关的“无辜路人”。类似这样的事件,对真相相当体现什么样的时效作出了深刻提醒。

舆情的背后是“事情”。真相的时效,说到底就是以真实、及时、可靠的信息,筑牢社会舆论与心态的稳固基础,就是在热点事件与社会情绪的互动中,理解公众对真相的较真,回应公众对真相的期待,就是以“零容忍”

的严肃态度核查事实,不枉不纵,以阳光驱散阴霾,以公信凝聚共识。

从现实情况看,现在的一些真相往往是被“逼”出来的。有的是观望心态重,水不烧开,不会想着关火,“踢到钢板”才正视问题,舆论发酵才慌忙行动,猜测四起再碎片化回应;有的是“施躲”惯性大,错误地以为不出场、不回应,时间会自然地让舆情降温,公众情绪会慢慢降火;有的是能力水平不足,缺乏足够的担当、有效的方式与舆论打交道,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被“逼”出来的真相,很容易陷入被动,即使最终能一锤定音,平息风波,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有的人反应迟钝,信息发布跟不上,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天下”“有的时候网上讨论得热火朝天,各种误

读已经传播甚广,但有关部门的回应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千呼万唤不出来,不是半遮面而是全遮面”……谆谆告诫,切中要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改革信号,意蕴深刻、清晰明了。

真相供给背后,有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之责任,显端正价值、维护公平之担当,见化异聚同、凝心聚力之水平。过去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现在是小事也会成为“现象级”,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就不会“躲进小楼成一统”;网络世界既生繁花,也长稗草,舆论场的自发性、突发性、多元性、无界性突出,清晰看到这一点,就会对真相供给的主动性多一些敬畏与重视,少一些打太极、躲猫猫、和稀泥、

拖字诀。  
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从早上起床,到午间休息,再到晚上睡前,甚至深更半夜,有多少人在看短视频、刷朋友圈、留言发声……中国网民的普通一天,构成了互联网时代舆情生成过程的一个切片。信息的生产、扩散、接收、观点的表达、传播、汇聚,就像一个有着无限量插孔的插座,能让无数人建立联结,就像是浪花的激荡、云朵的交汇,可说是风生水起,也可以说是喧嚣四起。

反复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那番话语,“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不断推进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载体渠道、制度机制创新,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不能不看到主动、及时、权威的真相供给所承载的社会治理之重、民心关切之深,因其如此,须臾不可忽视。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每年3600元,连续发放3年,而且不分一、二、三孩——这笔总额高达900亿元的育儿补贴,将于8月下旬正式到账,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一项全国性、普惠式的经济补贴制度,育儿补贴充分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政策意旨。在看到育儿补贴降低家庭育儿成本的同时,也应意识到育儿补贴并不是“万能钥匙”,激发婚育意愿不能依靠补贴实现单兵突袭,还需打好政策组合拳,营造良好的生育友好氛围。

结婚、生娃是人生大事,也是民生大事。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精简证明材料,到包括湖北省在内实行异地生育出院直接报销,免垫付、零跑腿,一些与婚育相关的政策悄然实行,体现了国家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上的务实举措。有人算过一笔账,除了每年3600元的基础育儿补贴,从怀孕到生娃的全流程里,还有产检补贴、生育津贴、男方陪护津贴、新生儿育儿退税、地方生育奖励金等可领取,为不少家庭大大减轻育儿压力。围绕激活婚育意愿,政策层面正在多重大力。

事实上,在养育负担中,育儿的经济成本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育龄妇女职场权益保障、普惠托育服务不足,以及育儿假期落地难等现实问题。尽管我国劳动法明文禁止性别歧视,但职场中女性因为生育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依然存在。一方面,国家从假期、补贴、医保等方面为育龄妇女提供更多保障。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施以各种隐性压力,导致女职工怕因为生孩子丢了岗位,怕因为照顾孩子花精力而影响晋升,而本应享有的育儿假期更是难以兑现。可以说,在育儿的经济成本之外,还有更重的社会成本、职业成本。这应成为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事,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生了,没人带怎么办?孩子多了,住不下怎么办?生育补贴之外,有的地方因地制宜推出购房优惠,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着眼于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在教育领域,为缓解家长的焦虑,不少地方想尽办法均衡优质教育资源,推行教联体形式,给学区房降温,给家长教育投资减负。把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做全、做细,生育友好社会的基石才更牢固。

## 水秀为何打了水漂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

8月2日,广西公开通报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一起是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未经科学论证,脱离县情实际上马“水秀”和“灯会”旅游项目。因前期投资风险评估不充分,这一投资2230万元的文旅项目,最终以“水秀”项目闲置、“灯会”项目拆除惨淡收场。

形象工程的危害早已被反复印证。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和产业升级的资金被挤占,大量资金投入到华而不实的项目中,忽视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合理布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这种资源错配,不仅损害了群众利益,也阻碍了地方发展。面子工程往往还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在项目决策、资金拨付、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党 and 政府的形象。

形象工程为何屡禁不止?一是政绩观错位,一些领导干部,或是作风漂浮,不深入调查研究,仅凭“拍脑门”就作出决策;或是将个人政绩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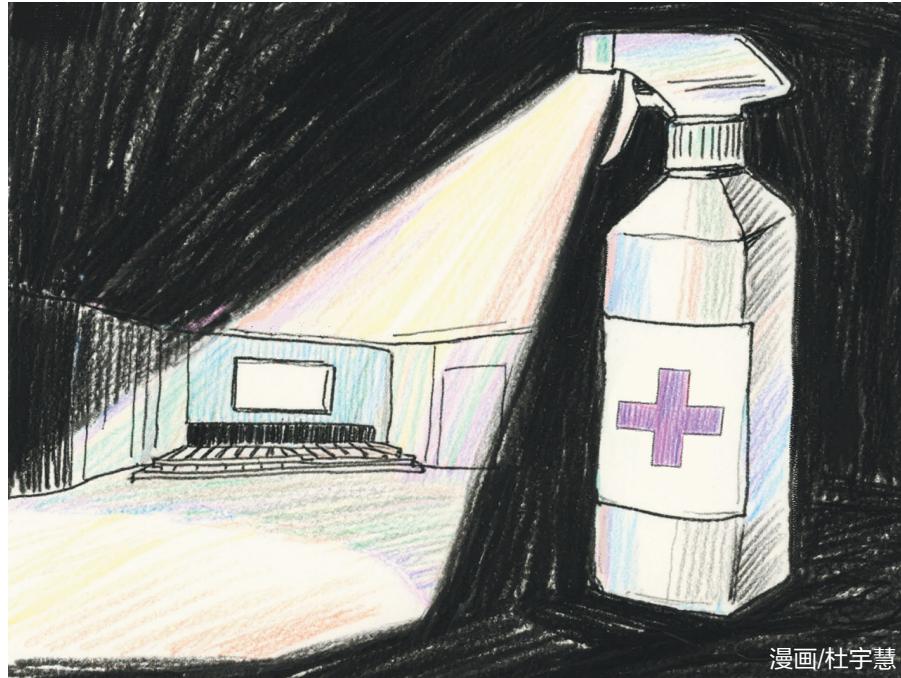
于群众利益之上,追求表面光鲜和“上级关注”,忽视了实际效果和民众需求。二是决策机制漏洞,像富川文旅项目暴露的“未经科学论证”问题,本质上是“一言堂”代替了民主决策,专业意见让位于行政意志。三是监督问责滞后,项目审批时“一路绿灯”,出问题后才“秋后算账”,这种“重建设、轻监管”的模式,无疑助长了“拍脑袋”决策。

整治形象工程,必须下大力气、动真格。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把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债务风险防范等关键指标摆在更重要位置。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重大工程项目全流程、穿透式监管,确保每一项工程都能够经得起检验。强化责任追究,对决策失误、违规操作、腐败行为等严肃问责,让相关人员付出应有的代价。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把心思用在为民造福上,才能让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时事绘

## 影院座椅不能成卫生盲区



漫画/杜宇慧

# 从清华学子成长为抗战先锋 杨学诚8条枪起步发展鄂中抗日武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袁丽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丰碑。

在省档案馆,有3份抗日英烈杨学诚的珍贵档案,记载了他从“书生”到“战士”的传奇人生。

19岁的他,从湖北黄陂考入清华大学,成为学生运动领袖。23岁时,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毅然回到鄂中农村,以8条枪为基础建立抗日武装。1944年日寇“扫荡”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大悟山时,他带病转移,最终牺牲,年仅29岁。

翻开尘封的档案,一位饱含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青年战士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

### 从“书生”到“战士”

“他敦厚朴实、样子有点像农民……红红的脸上,有一对坚毅活泼的眼睛。”省档案馆馆藏1950年东北日报刊登一篇纪念杨学诚的文章中,描绘了他的样子。

文章记载:抗战期间,在南下宣传团第三团中,他“打前站”,每天跑到前边去给下边宣传的同学们准备茶饭和房子。赶路的时候,他总是竞走式地半跑半走,像一个大孩子似的,常常跑得头发上冒着热气,可是每到一个地方,他仍然是被很多农民、学生包围着,听他讲当时中华民族的危机,痛斥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有很多人听了他大声疾呼的讲演,感动得流下泪来。

杨学诚是湖北黄陂人,1915年出生于黄陂研子岗罗村一户普通家庭。他自幼好学,成绩优异,1930年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又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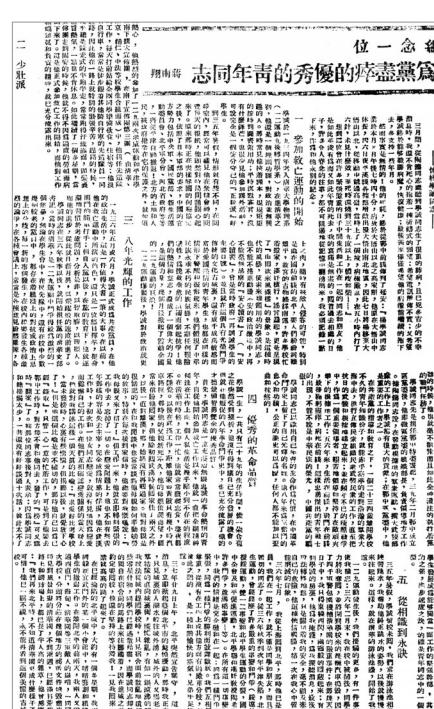
从农村走进清华学堂,十分不易。刚入校时,杨学诚埋头读书,每天夹着书本按时上课、按时到图书馆,平时沉默寡言,也不参加课余活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

但当时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三省后,进一步将魔掌伸向中华大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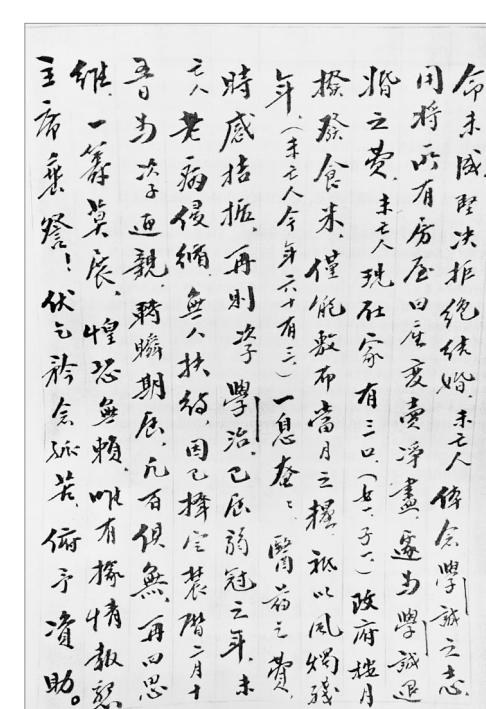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日本。成千上万富



杨学诚。(新华社发)



1944年8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纪念杨学诚的文章。



杨学诚的母亲写给湖北省政府的信。

(省档案馆供图)

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在时代风暴下警醒和震荡起来。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面对带血的大刀、军棍以及冰冷刺骨的水龙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振臂高呼,呼呼抗战。

他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开始成为一名“战士”。1936年5月,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他开始担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 就算讨饭也要跟鬼子干

1937年7月北平失守,杨学诚组织学生撤离,9月抵达武汉。

回到家乡,杨学诚把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联络在一起,办补习学校,号召大家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南京沦陷后,流亡到武汉的学生越来越多,杨学诚等发起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

建立30多个宣传队,派往各地宣传抗日。

1938年6月,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学诚赴鄂中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

档案记载,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时,那里一共只有十几个党员,基础很薄弱。

杨学诚到鄂中后即与一同被派往鄂中的陶铸深入农村,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300余人。

杨学诚千方百计抓武装,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杨学诚在潘家集主持了为期三天的鄂中特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深刻分析了整个抗战的形势,特别是鄂中的形势,提出“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拿起枪去跟日本鬼子干”。

在杨学诚的组织领导下,人人动手搞枪。当时有一名党员拿出1000多块银圆,通过各种途径,买到了德国造快慢机一支、驳壳枪一支、勃朗宁小手枪一支和仿制汉阳造步枪四支,子弹半箱,手榴弹十八枚,加上他家原有的

一支金陵造小手枪,组成了一支八条枪、十多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有名的“应城八条枪”。

省档案馆馆藏一份1944年的解放日报记载:曾经领导过鄂中工作的钱瑛同志说,鄂中建立武装是从八条破枪开始的。当时对那八条枪,学诚同志爱惜如命,晚上睡觉都带在自己的身边。在情势紧张的时候,他更是警惕小心,生怕枪支被人偷去或抢走,常常亲自上岗守夜,护卫那几支破枪。

### 带病坚持着战斗

杨学诚带着这支从八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向日寇开了火,而且打了胜仗。

1938年秋天,杨学诚他们就在汉水附近缴获了敌人一条运输船,而且活捉了两名伪军、一名日本鬼子。

在杨学诚的指挥下,这支从八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应抗”支队。

这支队伍在杨学诚的领导下一天天扩大起来,后来和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会合,成长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

1939年2月,鄂中成立区党委后,杨学诚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地方工作。1942年他又转赴鄂南建设抗日根据地。

但是,还未等他看到胜利的到来,他便不幸牺牲。

1944年正值日寇“扫荡”大悟山最凶狠的时候,杨学诚带病与敌人周旋。此前,他在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期间因受风寒侵袭,患了结核性肺膜炎,战争环境中,由于得不到休息和治疗,病情逐渐加剧,导致他体瘦如柴。当时医药条件极端困难,他带病坚持着战斗,念念不忘工作。3月9日,杨学诚不幸病故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29岁。

“学诚生前,未亡人家乡薄有恒产,学诚以革命未成,坚决拒绝结婚。未亡人念学诚之志,将所有房屋田产变卖净尽,遂为学诚退婚之志。”在省档案馆馆藏的一封杨学诚的母亲写给省政府的信中记载了杨学诚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了革命,他不愿成婚,舍小家为国家。

“他本是一个普通学生出身,从未搞过军事。但当革命的形势需要他拿起武器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而且如此全神贯注地执行着党的战斗任务。”解放日报高度评价杨学诚时说,在短短八年间,学诚同志从一个根本不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发展成为能够独当一面工作的坚强干部,其学习能力之强,进步速度之快,的确是青年同志中的一个光辉典型。

## 档案解密

(第149期)



湖北日报  
省档案馆